

第三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国壮 李慧芳

为加强中国经济史学界青年学者的交流,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发起了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第一届(2018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第二届(201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讨会均在青年学者中获得积极反响。继承传统,再接再厉,第三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8月8—9日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本次会议共收到投稿199篇,入选参会稿件40篇,来自国内外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和经济史研究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社社长朱恒鹏研究员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邹芙都教授在开幕式上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朱恒鹏研究员指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全国范围研究经济史的同仁们来说,是一场夏日学术盛宴,能够促进青年学者间更广泛的学术交流。邹芙都教授简要介绍了学院的发展情况,充分肯定了与会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预祝并期待会议讨论精彩纷呈、收获满满。

本次会议的论文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多元研究论题的关涉,研究时段上至秦汉时期的物资运输,下至现代农村农林发展;研究空间广涉江南塞北、大漠海滨,几乎涵盖了我国东北、西北、华北、西南、东南地区等大多数区域。其二,多样原始资料的使用,在强调未刊档案及外文资料利用的同时,亦青睐于对族谱、契约文书、纳粮底册等民间文献资料的搜罗及运用。其三,多学科分析方法的运用,除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外,还广泛借用金融学、地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有机融汇与调动其他学科的知识,对历史事实进行多维度解读。其四,现实关切的积极回应,国家治理及社会经济变迁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论题,学者希望通过分析历史时期的相关论题,积极回应当下国家及社会的重大关切。

一、明清赋役制度

赋税收入,是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中国历代王朝,均设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赋役制度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赋役制度一直是一个热门论题。五篇赋役制度论文充分利用民间文书,尤其是土地契约文书,考察了明清时期赋役制度的演变,并进一步思考此一时期赋役制度运作的原理。

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寄庄户的成立与长期延续——徽州富溪程氏的宋元明文书考析》一文,聚焦宋元明时期寄庄户这一群体的赋税缴纳问题。文稿在诉讼背景下,全面考证和分析“高岭录”为中心的各类文书,从长时段考察富溪程氏的寄庄户在宋元明赋役制度演变下得以长期延续的机制,进而为观察家族势力维护寄庄户及相关土地产业的主要措施提供了一个详尽的案例。丁亮(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明代徭役的双向流动机制与审编体系的调适》一文,详细地梳理了徭役流动性的实现方式以及里甲体系的调整过程,并描述了明代基层徭役体系的运行时态,由此

【作者简介】 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5,邮箱:zhaoguozhuang2007@163.com。李慧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重庆,400715。

指出明初赋役体制的建立遵循“指令经济”的逻辑,市场的嵌入主要是帮助王朝解决资源的汲取,体现出“单向流通”的特点,并不主要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前提,故而,不能认为明代市场的繁荣一定会推动赋役财政体系的货币化改革。申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赋役全书的形成与定型——清初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确立之基石》一文,考察了自正德末至万历后期各类财政经制册籍的演变,从核算关系角度对这些册籍进行分类,并通过对比阐明赋役全书的特征、职能,进而分析赋役全书在明末清初如何从巡抚等主导的省内集中管理册籍变成了户部重建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信息基石。盛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清代田地交易契约中的税粮初探——基于〈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研究》一文,以《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收录的902件熊氏田地交易契约为研究对象,关注前人较少涉及的“程式化”税粮表述和“静态的”田赋科则,探索文本中所呈现的税粮内容与土地赋税制度演变的表里关系,进而管窥国家制度在区域社会的运行实态。侯鹏(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16世纪江南田赋征收机制的转变与地域社会关系的变动》一文,认为地方政府推行均则改革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范、限制胥吏的作弊以应对越来越棘手的钱粮逋欠,而非调节纳粮户内部负担的不均,在均则改革时期,纳粮户内部所发生的冲突并不是其社会身份差异的体现,而是农业经营组织和农业经营规模差异的体现,这种变化是当时江南社会进入高度商业化阶段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乡绅支配形式的转变。

二、清代财政与税收

在中国财政史研究中,清代的财政史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断代史研究之一。五篇清代财政与税收领域的文章,利用地方志、族谱、纳粮底册、家族文书、碑刻、档案等民间资料,从微观视角对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了更进一步的解读。

王睿(大阪大学)《清代常平仓衰败的吏治表述与制度实际——基于黄梅案的考察》一文,以18世纪末期浙江省温州府平阳县的黄梅案件为考察对象,对常平仓衰败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文稿认为至18世纪后期,常平仓已经成为官僚群体的浮收工具,而为了维持这一浮收来源,官僚群体以吏治论作为政策的依据,将常平仓问题仅仅归责于官员个体,因此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常平仓制度的弊端迟迟得不到有效改革,从而与当时日益发展的粮食市场逐渐脱离,最终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而黄梅案便是这一衰败的缩影。王汉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江防、官工与地方财政:清代襄阳老龙石堤的修防经费研究》一文,在辨析清代官工和民工本质区别的基础上,通过对清雍正至光绪时期襄阳老龙石堤修防经费的梳理,考察了清代汉水官工江防乃至水利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的一种范式,文稿认为在清代国家政府的公共事业中,官工江防水利事业建设的长盛不衰及其重要性始终如一,与国家财政收支结构的转变并未有根本性的关联,却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体系休戚相关,体现出地方政府选择介入干预并主导官工水利事务建设的牢固性与富有弹性而有效的财政治理能力。马超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商人、牙行与书吏:清中后期重庆城的商税包揽及其变迁》一文,以清中后期重庆府巴县的商业差徭与厘金税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嘉道以降从地方社会生长出的一套由商人、牙行与书吏构成的商税包揽与陋规征收体系,探讨了重庆商税包揽所呈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州县司法实践的特性等问题,并指出咸丰年间重庆厘金的征收直接借用了既有的商税包揽组织,并使其得以正式化、公开化、制度化,形成“厘局—牙行—行帮—铺户”的多级征派组织。黄雅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花户的底册:晚清山东益都县村庄的纳税方式》一文,关注的是晚清乡村的纳税方式。文章利用清末山东益都县一个村庄的纳粮底册、族谱及大量家族文书,探讨村民如何分割税额,如何通过中间人代缴赋税,以及银钱兑换上的策略,揭示了清末益都县花户与包纳钱粮的中间人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银钱兑换上显示出的村庄内部的权力分配。刘雅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末民初上海县城财政的形成与构成》一文,以《上海市自治志》为基础史料,结合

地方志、《申报》等材料,梳理了清末民初上海县城财政制度的形成与收支结构,解释了上海县城在结合外部条件、自身优势等因素的情况下,如何组织形成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建设、管理经费需求。

三、茶盐征收和银钱体制变迁

盐茶税入一直是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银钱体制同样直接承载或者影响财政政策的施行及效果。以下五篇文章涉及秦朝物资运输、北宋茶盐新政、明代盐政、明后期马市市本、明清两朝的货币流通体制五个方面的内容,跨越多个历史阶段,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将个案研究与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反映了历史整体发展趋势。

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秦代物资输送形态试析——以“委输”输送为切入点》一文,以里耶秦简作为主要史料,细致地考证了“传送”“委输”“调均”三个概念的含义,认为秦国输送网络扩大的首要目的是将行政管理体系渗透到全国。张呈忠(上海大学历史系)《招诱商贩与抑配编民——蔡京茶盐新法的地方运作方式研究》一文,考察了北宋徽宗时期蔡京茶盐新法的地方运作方式,认为从宋代专卖政策的演进来看,蔡京茶盐新法自有其高明之处,但从其地方运作方式来看,经济政策与政治生态交互影响,唯利是图的经济政策败坏了政治生态,恶化的政治生态进一步造成经济政策的失败。叶锦花(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明中叶闽中官收盐策略及其演变》一文,考察了天顺至正德年间福建盐官完成闽中三场收盐任务的具体办法,探讨了官府解决收盐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的策略,并分析了相应策略与国家盐政、财政之间及与盐场组织、人群关系之间的关系,从运作层面加深了对明代盐政、财政的认识。吴兆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明后期宣大山西三镇马市市本来源考述》一文,认为明朝后期宣、大、山西马市市本来源呈现多元化,既有来自中央户部和兵部的银两,也有来自地方政府经费的支出,同时,在不同时段内三镇马市市本构成略有变化,隆庆至崇祯年间,市本构成经历了一个由多元化向一体化的转变过程,而太仆寺职能的变化折射出明后期财政管理的混乱。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国坤(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一文,梳理了明清两朝铜钱流通体制的转变状况,并从市场发展基础、有效货币需求、政府强力政策三个角度分析其转变的成因。该文认为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以后,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其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存在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是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四、近代工业企业发展

工业史、企业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该专题不仅包括从宏观角度长时段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变化的文章,还包括从微观角度探讨家族糖行、股份制公司商务印书馆、棉纱行业、冰蛋企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连续性与转变时段》一文,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在近代中前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起飞时段为考察对象,重新探寻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连续性与突变点,进一步刻画了工业化进程的真实曲线以及其内在连续性与继承性,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革命的早期形态及其内涵。赵婧(安徽大学历史系)《镇海方家糖行史》一文,以口述资料、族谱、报刊、征信调查报告为基础,尝试立体呈现镇海方家 130 多年的糖行历史,借以观察近代上海糖业,乃至近代中国糖品贸易的发展演变历史,比如闽粤糖商独霸上海市场、进口糖批量涌入、东亚糖品贸易圈形成、英糖与日糖激烈竞争、闽粤糖商日趋衰落、中国进口糖行诞生等。曾雄佩(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从商务印书馆看中国近代股份制公司的技术进步(1897—1937)》一文,基于《申报》、

公司规程制度等一手史料,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在改进与推广新式印刷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并讨论了股份公司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于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华洋商人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棉纱税率和税制》一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棉纱税率和税制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档案和资料,探讨了该时期华洋商人、税收与实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税制和社会转型。张跃(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卡特尔为何难以持久?——基于1930—1933年国际冰蛋卡特尔的研究》一文,以大量一手英文档案为基础史料,分析了在1930年11月至1933年间中、外资冰蛋企业组织实施国际冰蛋卡特尔的动机、内容,特别对这个国际卡特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五、近代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史研究虽是集中讨论某一特定区域的历史,但其研究视野却是全局性的,即它是从全局的高度来关注特定区域的历史,不仅仅偏爱区域历史发展特性的叙述,更留意此区域与彼区域之间的共性。东北地区的甜菜制糖业、青海河湟地区的城镇商业、广州地区的广梅铁路、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财政、解放战争时期的冀南银行都是青年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

徐岚(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糖用甜菜引入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1906—1949)》一文,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的日文资料为主体史料,并参酌相关中英文资料,对新作物糖用甜菜的引入路径及价值、糖用甜菜种植区域展开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及分析,丰富了中国糖业史及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勉卫忠(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商业史视域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近代青海河湟地区城镇商业为例》一文,以近代青海河湟地区城镇商业为例,探讨了其作为特定区域内各民族经济交往的核心场域,在推动所在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发挥的作用。王钊(复旦大学历史系)《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一文,初步考察了1936—1937年国民政府围绕广梅铁路借款的对英交涉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考量。高蓉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与通货膨胀的恶化——以国民政府抵押内债为主的探讨》一文,运用国债货币效应理论,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可能推动通货膨胀的各类情况,并重点论述了“国民政府利用内债向国家银行抵押借款”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魏晓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冀南银行信用合作事业述论(1945—1948)》一文,利用山西省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史资料,分析认为冀南银行的信用合作事业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该行扶持根据地农村发展信用合作事业的各种尝试与经验,为当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事业提供了业务、职责等方面的借鉴。

六、清代土地交易及近代商业习惯

土地作为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物质财富,其使用与买卖等相关活动是乡村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商业领域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中,商业习惯是重要的表征之一。

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和张妍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清代江南城隍信仰的组织化与城市社会经济》一文,以江南(高淳、杭州、上海、昆山等地)的《城隍庙志》和兰溪县鱼鳞册为核心史料,紧扣城隍董事、城隍会等参与主体,揭示城隍信仰在清代的组织化特征,探讨了城隍信仰组织与城市社会经济的深度联系。赵牟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土地典交易性质再论——以清至民国时期的土地“典租”交易为中心》一文,探讨了清至民国时期的三种“典租”式交易,从接近租佃、抵押这一端而非卖的这一端去分析土地典交易的形式与内涵,以及与诸种交易方式的内在联系。贾俊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华商研究中心)《20世纪上半叶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一文,运用了国内外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典藏的未刊档案以及报纸、期刊、调查报告等

资料,从民族情感、利益权衡、现实局势三方面相结合的视角,揭示了荷印华裔群体及中华商会在20世纪上半叶抵制日货运动中的态度和角色,并据此透视这一时期中国、日本和荷兰在东南亚的势力角逐及其对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林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近代东北和华北农村的社会网络——以民间借贷为中心》一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东北和华北55个村庄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认为近代东北和华北农户处于借贷交易、租佃、雇佣三层网络之中,当将这三层网络叠加在一起之后,可以发现不同农户之间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其背后驱动力主要是血缘和地缘网络,这支持了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论断。林胜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以20世纪30年代江西河口镇银钱业讼案为例》一文,认为讼案很好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面相,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转型,并非传统到现代单向的转型,也不是赢家通吃的对立博弈,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转型。

七、近代“商学”及现代经济发展

该组青年学者有从宏观角度关注经济学本身发展的,如“商学”在晚清的形成过程、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逻辑特征等,也有从微观角度探究集体经济时期工人年奖制度、林业与政区变动、农村副业等问题。

徐悦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物伦”的兴起:戊戌变法前后“商学”的形成》一文,认为经过沪上传教士、湘省维新人士、京师维新派及一众官僚的合力施为,“商学”这一近代学科概念,在戊戌变法前后逐渐形成,同时,这一过程也为庚子后新政时期的“商学”学科在全国的确立响起了前奏,也印证了以“造物养人”之法为尚的“物伦”已在知识界兴起。雷永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破旧立新”:北京工人年奖制度的存废与家庭生活质量(1949—1953)》一文,以北京工人为个案,探讨了在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中北京是如何结合中央有关年奖政策对其进行“破旧立新”,以及在这过程中年奖制度的存废如何影响北京工人家庭生活质量,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年奖制度存废中的多重面相。叶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林业建设与政区变动——以福建建西县为例(1958—1975)》一文,以福建省建西县为例,梳理了作为事业型政区的建西政区的演变过程,并认为建西的政区变动说明了经济事业兴衰在事业型政区存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李飞龙(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增产之“担”与制度之“手”:合作化时期贵州农村副业的困境与调整》一文,以山多地少、单产偏低、粮食压力极大的贵州农村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副业生产问题,揭示出此一阶段农业生产、集体副业、家庭副业三者之间较为复杂的逻辑关系。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毕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逻辑特征——基于高频被引文献的思想史视角》一文,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中1978—2017年间每年被引量排名前10位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逻辑特征,认为从普遍性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阵地、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特殊性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的学术史并不是一维的、单调的,而是类似于地质学上的“多层”结构。

八、近代区域社会治理

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科层制和行政区划造成的分割和阻隔。近代以来的区域社会治理理论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次会议的几篇相关文章集中讨论了这一论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

贺崑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宗商品出口与工业化——以近代中国东北为例》一文,构建了清末东北和华北各府新设工厂面板数据,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因果识别,进而检验了大宗商品贸

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发现清末东三省的大豆出口促进了当地新增工厂数量的增加。潘威(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苏绕(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民国时期新疆农田水利近代化成果的可视化与分析(1909—1935年)》一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重建了1909—1935年新疆农田灌溉体系数据集,以可视化方法展现了新疆各县灌溉效率的差异。李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黄天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暴力风险与合约选择:基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匪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运用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农村入户调查微观数据,考察了东北土匪抢劫等活动产生的额外暴力风险对当地乡村社会租佃合约的影响,认为在存在暴力风险条件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激励相对较低的分成合约来分担风险。庞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徐之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我国土改前后地权分配之比较:基于县志的研究》一文,从县志中搜集整理了1000余县土改前后地权分配的数据,并从多个维度(基尼系数、第一泰尔指数、地主富农占地百分比和不平等指数)测度了土改前后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其结果表明土改之后不论是县级层面还是全国层面,地权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下降。韦欣(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49—1979年行政区划调整的资源配置效应与经济增长》一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1949—1979年各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效果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级区划撤并和县改市行政区划调整提升了区划调整地区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本次会议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邀请了龙登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刘志英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何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陈硕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高超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国信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彭凯翔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魏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著名学者,主持分组讨论并对论文进行精彩点评。他们一方面高度肯定了与会青年学者扎实的史料功夫、多元的探究视野及敏锐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把脉每一篇论文,给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衷心助推青年学者快速成长。

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直行走在前进的路上,既注重经济规律及经济现象的总结及阐释,也重视回应当下国家及社会的重大关切,希冀能够提供一些历史智慧。国家治理能力及社会变迁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领域,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史研究对现实关怀的积极反映。同时,中国经济史研究依然多元纷呈,并多点开花,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关涉,还是研究方法及对象的讨论,均是广泛多样,给我们呈现出了比较多元的历史图景和比较完整的历史脉络。

(责任编辑:王姣娜)